

中图分类号:K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12)04-0066-(08)

上海城市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

——以1949年前的上海为讨论中心

李培德

(香港大学 亚洲研究中心)

摘要: 尝试通过口述史记录、回忆录和个人传记等不同资料,探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移居香港和台湾地区的上海人如何掌握上海城市生活的记忆和自我认同。此外,作为外来移居者,他们对非本地人和社会的观感如何,本地居民又如何看待他们?这种由各种生活体验和相关人、事、物记忆所交叉组成的“上海时代”回忆,成为他们对“上海认同”的一个重要依据,最后是否可以转化为今日上海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关键词: 历史怀旧;历史记忆;上海人;上海文化认同

一、导言

随着社会发展,经济生活改善,城市面貌急剧变化,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上海普遍出现一阵怀旧热潮(nostalgia)^①,人们无不以一种缅怀过去和自我认同的心态去看上海历史,因而坊间涌现大批的以“老照片”、“繁华录”、“旧梦”、“沧桑”为题材的书刊及图册,追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上海辉煌景况,颇受一般市民大众的欢迎。与此同时,亦带来了有关上海本土意识兴起的广泛讨论,而隐藏于怀旧热潮里的上海人对追寻自我历史和身份认同意识的高涨是不能忽略的。

无可否认,上海与任何世界各地城市一样,应有自己的文化认同或本位文化,问题是应用什么方法从上海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学、电影、

艺术中反映出来?本文尝试通过口述史记录、回忆录和个人传记等不同资料,探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移居香港和台湾地区的上海人是如何掌握上海城市生活的记忆和自我认同的。此外,作为外来移居者,他们对非本地人和社会的观感如何,本地居民又如何看待他们?这种由各种生活体验和相关人、事、物记忆所交叉组成的“上海时代”回忆,成为他们对“上海认同”的一个重要依据,最后是否可以转化为今日上海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从《台北人》到《上海摩登》 ——上海城市的记忆和文学书写

白先勇的小说《台北人》写作于1960年代,而成书于1971年,可谓脍炙人口,极受欢迎。该书的14个故事中有两个讲述来自上海的交际花,

收稿日期:2012-03-25

作者简介:李培德(1964-),男,山东人,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香港亚洲研究学会会长,主要从事近代上海人、香港人、台北人的身份认同和大都市的兴起研究。

分别是尹雪艳和金兆丽。两人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来自旧上海的百乐门舞厅。笔者认为《永远的尹雪艳》和《金大班的最后一夜》所反映的“台北人”不仅是对过去繁华上海的一种怀念,同时也是两种对上海意象不同态度的台北人心理,一种是高高在上看不起台北地方文化的人,另一种面是对前者的反弹,不甘心被欺压。

白先勇写这两个故事的动机,不能否认是与他的个人背景有关。白氏对昔日上海的辉煌时代留有极为深刻的印象,他本人亦毫不忌讳地说:

上海是个花花世界,像只巨大无比的万花筒,随便转一下,花样百出。国际饭店当时号称远东第一高楼……觉得饭店顶楼快要到摩天了……南京路上的四大公司——永安、先施、新新、大新,像是四座高峰隔街对峙,逛四大公司,是我在上海童年时代的一段兴奋经验。……那是个魔术般变化多端层出不穷的童话世界,我踏着自扶电梯,冉冉往空中升去,那样的电动扶梯,那时全国只有大新公司那一架,那是一道天梯,载着我童年的梦幻……

早年在上海的生活对我来说,已经积累成为一种不可磨灭的印迹,当时并不觉得有多么重要,直到开始投身写作时,才发现童年在这里所经历的那些事,对于我的作品有一种决定性的意义。^[1]

白氏对上海的强烈意象已经成为他写小说的一种风格,并广被接受。随白氏之后,李欧梵亦有类同的个人经历,而这种经历对他写作《上海摩登》一书有很密切的关系。他说:

一九四八年我曾随母亲到上海寄居一个多月……我那年是九岁,童稚无知,第一次进大城市,浑然不知电灯为何物,而上海的声光化电世界对我的刺激,恐怕还远远超过茅盾小说《子夜》中的那个乡下来的老太爷。……所以,我对老上海的心情不是目前一般人所说的“怀旧”,而是一种基于学术研究的想像重构。^[2](Pxi-xii)

虽然李氏强调写作目的非怀旧,但他在《上

海摩登》书内所论在上海出现的“新都市文化”,所谓“声光化电”,包括上文提及的城市建设和娱乐、印刷文化和大众传媒、现代文学的题材、文学家的世界主义观等等,无不出现于1930年代上海最繁盛的时代。

上海作家陈丹燕分别以上海永安公司郭家小姐戴西(Daisy,郭婉莹)和著名演员上官云珠女儿的悲痛经历写成《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的红颜旧事》两本小说,把上海的怀旧热潮带上高峰。当别人访问她时,她说:

上海人怀念从前;回忆,一直在上海人心里。

记得香港电视剧《上海滩》在上海播映时,年纪大的上海人一边看一边骂:那根本不是当年的生活情况,上海从前不是这样的。^[3](P159)

根据杜英对1990年代“上海创作”的分析,上海的身份认同对象多是指1949年前的上海,特别是1930年代辉煌时期的上海,而对于1949年后的上海只有“失落”的情怀,对比极为明显。^[4](P111-115)

杜维明把上海的价值取向综合地分为三个阶段:1949年以前;1949年至1992年;1992年到现在。^②很明显,杜氏的划分标准取决于政治并且把上海置于全国地位的角度来看。如果说白先勇、李欧梵所论“繁华的上海”出现于1949年前并消失于1949年后,而上海于1949年至1992年的发展又不突出的话,那么“再度繁华的上海”应出现于杜氏所论的第三阶段,即1992年到现在。不过,正如杜英所指,处于这一阶段的上海,其身份认同多被营造出来,是“被改写”的,影响了我们的学术研究。她提道:

除了文学、文化以及学术研究等的参与外,政府、经济(机构)等也主动营造上海身份。如石库门的开发,世博会的宣传等。……他们都共同参与了上海城市身份认同的营造。继续了1949年前的痕迹,浓缩了90年代消费文化的打磨,上海成为了一个被改写、被重写的城市文本。^[4](P119)

这种情怀主要体现在上海怀旧潮

中。它不仅表现在老上海故事的畅销,还表现在学者的学术研究中。^{[4] (P120)}

三、上海城市记忆和文化认同的标准

上海史专家熊月之提出比较客观的“上海形象论”,虽然他亦同意“繁华的上海”是出现于上述杜维明所指的第一阶段。熊氏认为上海的繁华景象最早可追溯自19世纪六七十年代,至1980年代初上海已有“东方的巴黎”之称誉,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已跻身于世界六大城市之列。^③值得指出的是,熊氏并非只看上海美好的一面,他同时指出上海亦有“丑陋”的面孔,特别是表现于道德、阶级压迫和民族歧视各方面。例如,在道德方面,他指出19世纪的上海普遍有所谓“七耻上海风尚”:一耻衣服不华美,二耻不乘轿子,三耻狎身份较低的妓女,四耻吃价钱不贵的饭菜,五耻坐便宜的独轮小车,六耻身无顶戴,七耻看戏坐价格最廉的末座。他说“七耻归一,就是今人所说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这与传统的重义轻利、崇俭恶奢的道德要求完全相反”。^{[5] (P145)}

熊氏认为这种“丑陋”的负面形象一般不会被人重视。例如他找到一段良民被流氓欺侮的口述资料,很贴切地反映了当时上海的社会实况:

一口痰吐了出去,错碰到过路人的鞋子上,这是无意识的小事情,按理来说,打一个招呼就无啥了。可是在那个时候,在旧社会里,而正好这口痰落到流氓脚上的鞋子上,这就会引起一场大祸。王兰英大姊吐了一可(口)痰,落到过路人的脚上,当她抬头一看,不是别人,而正是落到流氓头子杜小毛的脚上,赶忙想要打招呼,去替杜小毛脚上的痰沫揩擦,然而已经来不及了,拍、拍两记耳光已经落到她的脸上。打了之后还不算,流氓杜小毛一把抓住王兰英大姊的胸口,大吼一声“曲死,跟你今天买一双鞋赔我”。有什么办法呢?任凭家里没有一分钱,这双鞋子得一定要在当天赔给他,不然就难以过门。就这样去借了五

块印子钱,买了一双鞋子送到杜小毛家里。

王兰英大姊是不是只有被杜小毛打了两记耳光呢?不是,说起来还有更惨的事情。她被大康里另一个流氓头子崔忠德打过两次,那时她刚怀孕四月,被崔忠德打了之后,身受重伤,四个月的婴孩死在肚子里。^{[6] (P3)}

当然,这种不幸的遭遇不可能成为上海的“集体记忆”。令上海人倾慕的是经济繁荣、自由开放、企业家精神、中等阶级的生活方式等,因而上述很难成为一种大家都接受的认同。

到底,上海城市的记忆和身份认同根据是什么?坦白说,笔者只能提出问题,无法提供答案,因为记忆和身份认同本身是十分主观的,可谓因人而异。上海史学者卢汉超提出目前我们讨论的文化认同,不一定是来自上海的,有可能是上海以外的人对上海和上海人的“模式化”的认同。^④虽然如此,卢氏也同意西化使上海带来优越感、特殊感,更成为一种象征,即使“旧上海的西化在解放后的官方立场上虽然遭到批判谴责,但它在一般市民中却并未被真正搞臭”。^⑤

四、口述史、自传和回忆录中反映的上海城市记忆

众多在上海经营百货业的广东人的回忆资料中,以李承基的经历最引起笔者的注意,不仅数量多和内容丰富,而且完整。笔者更有两次亲身与他见面和进行访谈的机会,第一次于1997年4月,第二次于2002年10月。直到目前为止共有4种有关李承基回忆的文字记述,包括回忆录、口述史访谈录和自传,分别是:1. 李承基著《第二故乡》(香港:荟珍文化事业公司,1997年);2. 陈绛校、黎志刚访问记录《李承基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年);3. 李承基著《几番风雨忆前尘——李承基家族与上海新新百货公司》(香港:天地图书,2002年);4. 李承基口述,李培德采访《上海百货业口述史访谈录》,载《史林》总第112期(2009年6月),第32-41页。

李承基出生于1916年,7岁时随父李敏周到上海经商,直至1949年离开上海,前后共有33年的上海生活体验。在上海长大和受教育的李承基,虽幼年丧父,但受父亲影响甚大,希望完成父亲的遗愿,把新新公司办好。因此,李承基的“上海时代”具有这样特别的个人背景,归纳起来有以下几方面的重点:

第一,有关上海的另类描述。上海是繁华都市,有各式各样的物质诱惑和放纵欲望的机会,李承基经常警惕自己。他写道:

上海是龙蛇混杂的大都市,也是弱肉强食的社会,如何自保?如何立足?确是一门大学问,更是一个大难题。例如,应付三山五岳的江湖朋友,既不能太接近,又不能太疏远。要软硬兼施,保持好感。应付军政官海的达官贵人,要不卑不亢,要手段灵活,尽敷衍的能事,又会充分加以利用。在酒色财气的交际圈子,要有豪情,更要有豪气,但要保持清醒,抱着逢场作兴的用心,适可而止。在莺莺燕燕的脂粉阵里,切戒贪念,毋纵私欲,能够洁身自爱,时有“回头是岸”的警惕。一般人,都羡慕我的豪华生活,超越地位,但是,很少人知道我内心的彷徨,内心的空虚。更没有人了解我所受精神压力的痛苦,应付人事压力的负荷。^{[7](P161~162)}

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在这乐园创天下,必须和各方人士接触,更难逃逸物欲的诱惑,声色的陷阱。我是凡夫,我是俗子,具有六欲七情,也曾受到多次强烈的诱惑,也曾踏入了脂粉的藪泽。……^{[7](P251)}

那时,我年事尚幼,一派天真,只有一个直觉,上海是人间的乐土天堂。却没有机会见到上海黑暗的丑陋和罪恶的一面。后来,长成了,才憬然醒悟,上海是“长安地,不易居”的大染缸,五花八门,光怪离奇,无所不有,也无奇不有,稍一不慎,常遭没顶之虞。^{[7](P100)}

上海社会好像一座大染缸,五颜六

色,缤纷迷人。不过,见惯了大阵仗,大场面,也可以锻炼自己,养成一套镇静的态度。在不动声色中,按着常规应付,不会被对方的气势而慑伏了,也不会被对方的诱惑而失去了主见。正所谓“见怪不怪,其怪自败!”^{[7](P322)}

第二,从无到有,再到一无所有。1949年李承基为避免国共内战而忍痛放弃所有在上海苦心经营的事业。不过据李的忆述,虽有可惜但从无后悔,他曾多次流露这方面的情怀。从另一角度看,上海时代的终结正是为李移民澳洲而掀开序幕。他写道:

到一九四九年后,我们才全部撤离大陆,其中经过历程,悲欢交织,惊险迭出,虽然事隔了多年,如今回忆,仍觉得历历在眼前,清晰恍似在昨天。^{[7](P101)}

现在,我在澳洲追述往事,觉得自己极为幸运。如果我当日留置在上海不走,难免会有比郭琳爽(笔者按:永安公司经营者,1949年后坚持留上海)更惨的遭遇。有许多亲友在事后问我,既然已决意留在上海,而且还得到潘汉年的保证,可以安心落实,为什么在最后关头,我却突然改变主意,神不知鬼不觉地逃出上海呢?这是另有原因的。^{[7](P362)}

当日,我在上海失去了一切——“事业”,“地位”,“财富”。现在,我在澳洲获得了一切“自由”,“平安”,“快乐”。^{[7](P379~380)}

第三,李承基在改革开放后重返上海有焕然一新一新的感觉,“历史怀旧”变成一种新的价值观而受到保护:

我今次回到上海的最大感触,是看到“文革”及之前要把旧东西扔个清光的极端做法不再重复,现在他们却反其道而行,要保存所有旧东西,因此我走在南京路上,看见茂昌眼镜公司、老大同、新雅酒楼,全都是老字号,那个大三元,怀旧气味依然;当然现在的格局有点不同,旧瓶换上新酒,旧铺换上新店名,细小的店铺如“梅龙镇”也在,时代已经大

大地改变,上海市以外的人进来,打起旧招牌以广招徕。^{[8](P32-41)}

笔者记得于2001年12月第一次在上海作广东人的口述历史访问时,曾到过昔日广东人聚居的永乐坊,无意中遇到正在里弄值班的中山人张先生,留下深刻印象。他有很强烈的自豪感,他说住在上海已有46年,母亲现在76岁,顺德大良人,60年来从没回过乡下,父亲当永安纺织厂工人,自己受教育不多,受文革影响,个人事业发展有限。他有个十几岁的女儿,但不愿意学广东话,他对我说在今日上海英语和广东话都很重要。突然间,张先生趾高气扬地对我说:“身为广东人甚为骄傲,广东人不摆地摊,要做生意都是要做大的,从父祖辈听说广东人历来与宁波人不好,商场上竞争极大。”我当时的反应是,虽然张先生已在上海居住多年,已同化于本地文化中,但他仍有一种以广东人自居的骄傲,因为广东人在上海有过辉煌的商业繁盛日子,自豪感不言而喻。

五、当上海人遇到非上海人 ——“认同”的冲突

如果说上海人有一种“海派”作风,姑勿论这是否为一种文化认同,但可以肯定的是,并不是所有人都会欣然接受。当处于变动的年代,上海人由上海迁移到重庆,继而香港、台北和其他地方,都与当地文化产生磨擦,上海人的身份便会受到批评。

1. 上海人遇到香港人

上海人较有规模地移居香港,发生于二次大战前,不过相对于其他福建、潮州或客家族群,苏浙或沪籍人士只是一个小数目,并且由于居住时间短,他们多不认为有融入本地社会之需要。香港居民对于外来人士,只要操非粤语的,一般都被视为省(即广东省)外人,俗称“外江佬”。而操吴语的苏浙人士当然不例外,把“老兄”(lao xiong)念成“拉松”(lai sung),多少反映了本地人对上海人不甚了解,并且存有排外之心理。

穆时英于1938年2月写到香港人对刚从上海来的移民的观感时,一方面指出沪籍人士的挥霍习惯并未因移居而更改,揶揄他们不顾“仍在

敌人魔掌底下”艰困地生活的同胞;另一方面讽刺香港本地人十分势利,虽然不喜欢但也不敢轻蔑对待来自富裕地区及先进社会的上海人。

八·一三抗战开始以后,香港更变成了全中国唯一的、最安全的现代都市。香港本来只有60万人的,里边只有45万是固定居者,其余15万是跟船舶来去的移动人口,在这短促的两个月中,突然增加到100万。这小岛已经膨胀到快爆炸了!不见了多年的景气,迅速地不可思议地到来,从金融资本家到码头苦力都发了财,商店伙计看见外省人走进来马上就堆上笑脸。当地土人不再用“拉松”两字来轻蔑地称呼外省人,而把所有的外省人都称为“上海人”。因为流亡到香港来的差不多都是中国最富庶的江南区域里边最富庶的高等华人。这些人正是最有购买能力的消费者。最贵的房屋被租去,最贵的钻石卖了出去。省俭的、一钱如命的广东人所不愿碰的奢侈品,都从上海人那里换取了法币。满街都是异乡人和异乡音。舞场里边坐满了上海来的舞女,也坐满了上海来的舞客。永远没有满座过的戏院也关了三天铁门。从敌人刺刀下逃出来的人们,看一下这太平盛世的升平气象,想起死亡在炮火下的父母兄弟姊妹们,是不能不一面感伤,一面愤慨的。^⑦

值得指出的是,1938年4月萨空了撰文批评这批挥金如土、逃避战火洗礼的“难民”(上海人),把奢侈的生活习惯带到香港,影响实在太深:

到香港常常听到许多新朋友恭维上海是中国文化的中心,上海的文化人都是先进。

即使上海确是过去中国文化的中心,是不是每一个上海的文化人就一定都是先进,在逻辑上是颇有问题的。

不过上海人一拥而来,到香港十几万,这大量的移民,自然要影响了香港,他们给香港带来了一些甚么呢?关于这

一点一个广东朋友曾给我举过一个例,他说:以前在香港乘一零雇汽车(即的士),表上跳出来的是九角五分,用一元给汽车夫,他一定很老实地找给你五个仙,你自己也可很坦然地把那五个仙放到衣袋里去。十几万上海人来过之后,一切不同了,你坐七角钱的车子,给一元钱叫汽车夫找时,他道了一声谢,竟而想没收你所余的三角钱,作酒钱了。

除了这个例子以外,还有许多其他的事迹与此相仿,由文化中心逃难来香港的人带给香港的只是挥金如土一类的豪举,上海是文化中心的憧憬,如此实现的证例已渐在港人心中破碎了。^⑧

1941年5月,杨彦岐则从不同角度去批评上海人对香港和香港人对上海的看法。他批评香港人对上海先进事物的盲目追求,最后只会令上海人更加“看不起”香港:

从上海到香港的人都会有两种感觉,一是地太小,二是人太笨。每天中午十二时许,上海外滩至日升楼的那段,汽车的伟观,是香港所没有的。国际饭店的廿四层商楼,还是香港人之梦想。香港也有跑马地(即跑马厅),但比起上海之跑马厅,简直是一块小草场。近三年来,上海有甚么,香港便也想有甚么。甚至于上海有百乐门舞厅,香港也要来一家,虽然香港的这家只及到上海那家的百分之一二。

至于外江佬之来香港,可说是香港之大转机。三四年前,香港人文化程度的低落,可怜而可笑。近来外江佬替这地方带来了文化,但处处犹反映出当地人的可笑。记得我爱说一个笑话“他们连猪肉都不会吃;只会吃叉烧。”但是我自己来香港半年,毕竟学了半像不像的广东话。^⑨

香港是一个移民社会,外来人口占绝大多数,但大部分的移民都来自广东,经济实力较来自上海的富户逊色,生活习惯自然与之不同。他们眼见上海人挥霍无度,对这种“海派”作风,与台湾

人一样,都极为反感。^{[9] P62~65)}

2. 上海人遇到台湾人

有关这一方面,游鉴明根据当时的报章作了辑录,现引用其中数段如下:

但有论者则是怪罪于海派的奢侈作风,例如刘芝指出,战后三年来,台湾女性“脂粉涂着更浓了,衣服穿得更漂亮了”,也染指甲、涂口红,配戴玻璃皮包、穿着高跟鞋。她强调这是“三年来的‘海风’,把素净的台湾姐妹吹得变色了”。(刘芝《从现实看妇运》,《新生报》,号1332,1949年6月29日,版4。)^⑩

不像在上海等地“动不动要吃到流氓店员‘你买得起吗?’一类‘冲盘’的危险”;秋凡还强调台湾女店员的态度让雇主乐于花钱购物,因为客人出店门时,售货员会“郑郑重重娇滴滴的道声谢谢”。(秋凡《活跃在生活战线上的台湾女性》,《台湾之声》,2月号,页15。)^{[10] P15~16)}

不幸,习于港沪奢华女士们不仅没有能向台湾妇女看齐,反而在不知不觉中诱致了多少年轻的本地女郎和她的同流合污。(陆巍《妇女界的警惕》,《中央日报》,号7652,版7。)^{[10] P16)}

六、结语

记忆是个人的、主观的,由历史记忆而产生的认同当然可以被接受。不过,对于被创造出来的记忆或认同则必须加以识别。1990年代出现的上海“怀旧”热潮,无疑对我们的历史视野造成干扰,但毕竟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是不难从中辨别的。上海的集体记忆,从今日的角度来看,姑勿论是否受到“被营造”的怀旧热潮或身份认同的重新建构过程影响。显然,1930年代和1949年前的上海,与1949年后的上海截然不同,都已成为如个人李承基记忆的一部分,而这部分的记忆又是不能人为地去加以改造的。

无可否认,如历史学者盖第·阿尔嘎兹(Gadi

Algazi) 所说“真实的记忆经常因集体记忆或大众对过去意象的过分集中而被忽略。”^①如何能够做到不过分集中,不让真实的“历史”溜走,今后是我们必须注意的问题。

正如学者所指,“上海人”的真正含义,并不简单拘束于籍贯,而是由工业化、移民社会、国际城市等多种因素综合而成的“地域人群”。^②因此,无论是在上海的广东人或是上海本地人的生活史,都应受到重视。毕竟,生活体验才是身份认同的源头。相反,在没有生活体验的条件下根本不可能去讲求“认同”,李承基的例子最能说明这一点。

李承基的经历告诉我们,他的“上海时代”生活体验正是他怀念上海故人、故事和认同上海的最重要依据。当然,并不是所有具有上海时代经验的广东人都对上海有相同的“认同”。^③当上海人大批移居台北和香港时,如果不能与本地社会融合,磨擦和冲突自然在所难免,上海人在战前的香港和战后的台北都遭遇相同的经历,受到本地社会的排斥。难道身份认同对上海人来说,就只有优越感吗?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本文曾于2005年11月,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之“记忆载体与近代中国的认同结构”学术研讨会上发表,承蒙评论人沙培德(Peter Zarrow)教授提供宝贵意见,谨此致谢。

注释:

①洛枫根据弗兰德·戴维斯(Fred Davis)所著 *Yearning for Yesterday: A Sociology of Nostalgia* (New York: Free Press, 1979), 对“怀旧”的思想和意识状态有这样的分析:首先“怀旧”有美化过去的功能;其次,是建立自我身份(identity)的途径。“怀旧”可分两个层面“私人的怀旧”(private nostalgia)和“集体的怀旧”(collective nostalgia),前者是个人历史与记忆的追思,后者是在追思的过程中含有集体的意识、倾向和行为。见洛枫著《世纪末城市》,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61-64页。王也扬认为“人们之怀旧,非怀念过去丑恶的东西,而是怀念那些美好的东西。在这些美好的东西中,最主要的是人性美。哪怕于苦难时代、悲惨世界,无论是大英雄,还是小百姓,人性美一概存在,同般感人,有永恒的价值。”见王也扬《“老照片”引出的史学话题——关于历史学理论的断想》,《史学理论研

究》2000年3期,第128页。

②杜维明《全球化与上海价值》,《史林》2004年2期,第71-72页。1949年以后的上海历史并非本文讨论重点,但相关的历史记忆和身份认同问题,可参考潘天舒两篇论文:Pan Tianshu, “Historical memory, community - building and place - making in neighborhood Shanghai”, in Laurence J. C. Ma and Fulong Wu (eds.), *Restructuring the Chinese City: Changing Society, Economy and Spac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p. 122 - 137. “Place attachment, communal memory, and the moral underpinnings of gentrification in postreform Shanghai”, in Arthur Kleinman (ed.), *Deep China: The Moral Life of the Person: What Anthropology and Psychiatry Tell us About China Toda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pp. 177 - 212.

③熊月之《历史上的上海形象散论》,《史林》1996年3期,第143-153页。有关“上海人”身份认同的由来,可参考 Xiong Yuezhi, “The image and identity of the Shanghainese”, in Tao Tao Liu and David Faure (eds.), *Unity and Diversity: Local Cultures and Identities in Chin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99 - 106.

④熊月之亦持相同的观点,他引用日本作家横光利一的说法“我认为上海人自己对上海的看法都不是正确的,外国人的看法当然也不正确。……关于上海,究竟谁的看法最正确呢?……这些事情形成了人们对上海的印象。但是,如果我们仅靠这些事情就对上海进行判断,真正形成上海的印象的话,是不可能的。”出自横光利一《上海故事》,保昌正夫等编集《定本横光利一全集》第14卷(东京:河出书房,1982年),转引自熊月之:《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笔谈》,《史林》2002年第4期,第2页。

⑤卢汉超《上海城市的文化认同及其开放与容纳》,《学术月刊》2004年7期,第56-59页。此外,卢氏认为城市化和现代化都使上海人有优越感,继而产生认同感,见 Hanchao Lu, “Urban superiority, modernity and local identity: a think piece on the case of Shanghai”, in David Faure and Tao Tao Liu (eds.), *Town and Country in China: Identity and Perception* (Basingstoke & New York: Palgrave, in association with St. Antony's College, Oxford, 2002), pp. 126 - 144.

⑥要感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钻友的安排。

⑦穆时英《英帝国的前哨:香港》,刊于1938年2月21日《宇宙风》第61期,转引自卢玮銮《香港的忧郁——文人笔下的香港(1925—1941)》,香港:华风书局,1983年,第88页。

⑧萨空了《建立新文化中心》,刊于1938年4月2日《立报》第4版,转引自卢玮銮《香港的忧郁——文人笔下的香港(1925—1941)》,第101-102页。

⑨杨产岐《香港半年》,刊于1941年5月1日《宇宙风》第44期,转引自卢玮銮《香港的忧郁——文人笔下的香港(1925—1941)》,第207-211页。

⑩游鉴明《当外省人遇到台湾查某:战后台湾的女性论述(1945—1949)》,第9页。该文于2003年7月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举行的演讲会上发表,两年后以《当外省人遇到台

湾女性: 战后台湾报刊中的女性论述(1945—1949)》刊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7期(2005年3月),第165—224页。不过,原来有关台湾人对外来上海人(外省人)的观感部分则未见收入。

⑪Gadi Algazi 《记忆研究的问题与历史学家对记忆研究的特殊组合》,澳门利氏学社主办“历史与记忆——反思过去,建设未来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摘要,2005年12月。

⑫卢汉龙《上海解放前移民特征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7年第1期,第142—143页; Lynn White, “China coast identities: regional, national, and global”, in Lowell Dittmer & Samuel S. Kim (eds.),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54—193.

⑬在由东亚银行自己组织编写的25年史里,除了介绍上海分行成立过程和标致的建筑大楼外,并没有详细讨论东亚银行在上海发展的一段历史。参见冼玉仪著,陈毓雷、李仲贤等译《与香港并肩迈进——东亚银行(1919—1994)》,香港:东亚银行,1994年,第19—22页。在数年后由著名报人秦家骢所撰写的李氏家族史里,有关其上海发展的经历也是只字不提。见秦家骢著,蒙宪、蒙纲译《香港名门——李氏家族传奇》,香港:明窗出版社,2002年。

- [1] 王晋民. 白先勇文集[C].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0.
- [2] 李欧梵. 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 1930—1945 [M]. 毛尖译. 香港: 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0.
- [3] 林翠芬. 跨世纪文化名人访问录 [M]. 香港: 花千树出版有限公司, 2002.
- [4] 杜英. 对于1949年前后上海的形象与叙述——以90年代的上海创作为例[J]. 文艺争鸣, 2005 (2).
- [5] 熊月之. 历史上的上海形象散论[J]. 史林, 1996 (3).
- [6] 卢湾区地方史专家许洪新收集. 流氓称霸里弄 [A]. 熊月之. 口述史的价值[J]. 史林, 2000 (3).
- [7] 李承基. 几番风雨忆前尘——李承基家族与上海新新百货公司 [M]. 香港: 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2002.
- [8] 李承基口述, 李培德采访. 上海百货业口述史访谈录 [J]. 史林, 2009 (S1).
- [9] 李培德. 略论1940年代寓居香港的上海人 [A]. 双龙吐艳——沪港之文化交流与互动 [C].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沪港发展联合研究所、香港亚太研究所联合出版, 2005.
- [10] 游鉴明. 当外省人遇到台湾女性: 战后台湾报刊中的女性论述(1945—1949) [J].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2005 (47).

参考文献:

Historical Memory and Cultural Identity of Shanghai City ——A Case Study of Shanghai Before 1949

LEE Pui-tak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Hong Kong University, Hong Kong)

Abstract: Based on such materials as records of oral history, memoirs, biographies, and so on, the paper explores how Shanghainese who immigrated to Hong Kong and Taiwan in 1930s and 1940s acquired historical memory and cultural identity of Shanghai city. Furthermore, as immigrants, what feelings did they have about non-local residents and the local society and how the local residents treated them? The memories of “Shanghai age” are composed of various life experiences and memory of relevant persons, events and objects, which become one important basis of their “identity of Shanghai”. Are they eventually transformed into the important parts of Shanghai history of today? The paper focuses on the discussion of the above issues.

Key words: historical nostalgia, historical memory, Shanghainese, cultural identity of Shanghai

(责任编辑: 申浩)